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丛书主编 周家伦



主义与问题论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

◎ 李占才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丛书主编 周家伦



主义与问题论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

◎ 李占才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为了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从历史、民族、现实等多重角度进行分析,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土壤解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研究等等。

本书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及其他相关人员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义与问题论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李占才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608-4157-1

I. 主… II. 李…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676 号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主义与问题论析

李占才 著

责任编辑 张智中 责任校对 张德胜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2.25
印 数 1—2100
字 数 445 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157-1

定 价 4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主 编 周家伦

副主编 丁晓强 李占才 端木怡雯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晓强 王 滨 仇华飞 李占才 李 渡 邵龙宝
张 劲 周家伦 周敏凯 章仁彪 端木怡雯

作者简介

李占才,男,安徽省利辛县人。

1982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安徽省宿州师专、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同济大学任教。现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苏州市科技拔尖人才。并获同济大学名师、同济大学“师德师风优秀教师”、宝钢优秀教师等奖项。

学术研究涉猎的领域主要有:中国现当代通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国铁路史、铁路与中国近世文明,抗日战争史,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等。出版著作(包括独著、主编、合著)20部。发表论文80多篇。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有力地领导、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同时不断地总结自己实践的经验教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发掘和提升广大民众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成果,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高等院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教育为本,德育为先。教书育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发展,多元文化渗透、影响加剧的背景下,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升全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自为能力。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同济大学当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博士点授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授权,学校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强有力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仅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其成果提供展示舞台,更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参与。几年来,该学科的学术骨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根据学术骨干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已有研究的成果、研究课题,我们决定以文集、著作形式编辑出版《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出版该研究论丛,既是对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检阅,也是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鞭策。希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队伍再接再厉,更深入、更务实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周家临

2009年7月

前言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并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带有中国的作风和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机械地“结合”,像水与面粉的关系,和在一起,变成面块,蒸出馒头吃掉了。而是有机地结合,双向互动式地结合。就像雨滴与水的关系,成为一种新鲜的活水,又升成新的水蒸气,化作新的雨,再降落水中,活化水源。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结合”的过程和“结合”的结果,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中国化?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的两大课题。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进取,从清政府自救自强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奋起抗争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都没有完成历史使命,没有解决两大历史课题。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需要新思想作指导。近代中国,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为救国图存、强国富民,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法图强,旧三民主义,以至于无政府主义及全盘西化思潮,等等,都未能够指引中国真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况,解决中国生存危机,解放中国生产力,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使中国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民族的崛起和腾飞。这些思想、思潮,也没有能够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运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传入中国,并在中国逐步扎下根来,逐渐为中国人民群众所掌握。随着中国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日益显示出伟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

就焕然一新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这与中国社会土壤是密不可分的。研读中国基本国情,可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现实依据。研究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理解、领会,可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研究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建设及其经验教训,可以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研究共产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应对社会变革的思潮,可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可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规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升华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经验总结,对现实问题的判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和发展。

本人学的是历史学专业,主攻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没有有意识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涉及基本国情、根据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产党人的经济思想、人民群众的经济思潮等方面和领域。2002年调入同济大学以后,从事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遂把自己研究的侧重点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方面,还作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面的研究。

现选择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编成一个集子。为了客观反映本人的学术历程和不同时期的学力程度,以及撰写论文时本人的思想脉络和主要观点,收录论文集的文章未作润饰,只对一些明显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修改。由于论文发表于不同刊物、不同时期,论文的注释不尽相同。为了保留论文的原始风貌,编集时未作大改动,只按照编书的要求,把原来的脚注、文中注统一为文尾注。按照内容,本文集分为七个板块,收录论文39篇。

从1985年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本科学士论文至今,已经20几个年头过去了,本人也从“年富力强”走进“老头儿”的行列,从已经发表的80多篇论文中选出符合本命题、与本命题相关联的39篇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反映本人学术生涯的全貌,但基本上概括了本人学术研究成果精华的主要部分。现诚惶诚恐地奉献给大家,恳请批评指正。

李占才

2009.9于上海寓所

目 录

总序

周家伦

前言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土壤解析	(1)
1.1 大革命后期国民革命军“兵随将叛”剖析	(3)
1.2 试析五四时期美国对华影响	(15)
1.3 近代实业家荣氏兄弟经营之道析	(21)
1.4 试析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统兵方略	(32)
1.5 铁路与中国近世文明研究(4 篇系列论文)	(42)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管窥	(73)
2.1 五四时期的《星期评论》	(75)
2.2 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	(86)
2.3 陈独秀五四时期的人口观	(93)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探微	(99)
3.1 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再认识	(101)
3.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基本思想	(110)
3.3 试析共产党人早期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	(120)
3.4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时代的抉择	(127)
3.5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136)
3.6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论争	(147)
3.7 试析建国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过频过急的负面效应	(154)
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析	(163)
4.1 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若干思考	(165)
4.2 试析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175)
4.3 试析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思想	(180)
4.4 建国初期刘少奇关于发展战略的构想	(194)

4.5	论陈云建国前后经济思想的历史启迪	(202)
4.6	试析建国前后共产党接管城市及对国有资产企业的管理	(214)
4.7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财经金融思想	(224)
4.8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调整工商业的思想	(232)
4.9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劳动就业观	(237)
5	民众思潮及其社会变革因应心态研究	(243)
5.1	试析建国初期社会经济思潮	(245)
5.2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社会思潮及民众因应心态	(253)
5.3	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社会经济思潮	(259)
5.4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思潮	(267)
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研究	(273)
6.1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	(275)
6.2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若干思考	(285)
6.3	关于减轻农民负担与裁撤乡镇政府的一些思考	(296)
6.4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本	(304)
7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探索	(313)
7.1	和谐育人,德育才有效	(315)
7.2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些体会 ..	(325)
7.3	传统文化与道德素养	(333)
7.4	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	(339)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社会土壤解析

1.1 大革命后期国民革命军“兵随将叛”剖析

国民革命军伴随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主旋律,在北伐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立下了功勋,确实是革命的军队。但是,在革命深入的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中的大批曾一度追随过革命的军官将领,先后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广大兵士,则跟随将领,背离了革命,从而使国民革命军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队。究其蜕变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准备就“兵随将叛”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剖析。

一

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是由党军、军阀旧部改编的建国粤军及其他名号的拥护国民政府的军队改编而成的。这些军队,都是实行的募兵制。虽然国民党“一大”发表政纲,规定“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①。但是,新建立的党军也仍然实行的是募兵制。

募兵制,具有严重的雇佣性,它是建立在当兵吃粮拿饷银的观念上的。应募者当兵为了拿饷,对于国家、民族、人民,未承担任何义务,不负什么责任。中国古代,秦始皇行发谪之制;汉代募死刑遣罪人;北魏“谄削选格、排抑武人,使不得豫清品”;宋代专招集坊市无赖子弟为兵;元代募亡命,派遣刑徒从军;明代募盗为兵;清代充军代刑。久而久之,民众便产生了服兵役鄙贱的心理。所谓“好男不当兵”的观念,便深入人心。人们都以当兵为耻,事实上招募兵丁就仅限于品性不良、生计困难一类的人。正像《通考》所说:“自募兵之法行……愿应募者非游手无籍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②

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农村经济凋敝,破产农民日增。北洋军阀统治时起,兵连祸结,殆无宁日。大小军阀都拼命招兵以扩充实力,这倒

为破产农民提供了一条“就业”门路,募兵制进入了我国募兵制度史上的黄金时代。冯玉祥曾说:“中国农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的投军入伍,以谋出路。”^③冯玉祥每每招募新兵,就派员高喊“招募新兵!招募新兵!大白米,细洋面,一月管饷六块半”这一具有诱惑力的口号,以招揽破产农民应募^④。以致在一个县镇,千儿八百名新兵,三五日也就招募足额了^⑤。

应当看到,近代自湘军始行募兵制以来,兵饷确实是很优厚的。民国以后,农民贫困破产日剧,兵饷就更显得丰厚。1916年彭德怀应募入湘军当兵,“开始当二等兵,月饷五元五角;不久为一等兵,月饷六元。当时伙食费每月一元八角至二元,每星期六吃肉。每月除伙食零用,可剩三元八角,每月以三元至三元五角寄家”。^⑥这种兵的待遇,无疑是优裕生活了。国民革命军中的兵饷,比其他军队的兵饷,还要优厚些。上士每月20元,中士16元,下士14元,上等兵12元,一二等兵皆10元。炊事兵、饲养兵也是10元^⑦。当时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士兵一月所获饷钱,能买到不少实物。当时农村中的雇工工资,远远低于士兵所获之饷。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会破除传统心理而积极应募当兵的原因。冯玉祥的“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⑧;蒋介石部下的兵士系“做人家的牛马奴隶”^⑨的贫苦人。可以说,破产农民“乐意”当兵,正是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

况且,士兵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之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⑩因此怕“失业”“砸饭碗”,一般不愿轻易地离开军队。而且已应募的士兵,经过军中附设的短期军事学校训练,或作战勇敢者,则可能被提拔为军官。这对欲应募者和已应募者,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应募当兵,是为了拿饷。士兵要想长期拿饷而不“失业”,要想爬上官位,都不能得罪自己的长官。饷,从招募者——长官的手里得到,官,也只有从长官手中才能得到。现实从无形中加深加固了兵士们隶服于长官的雇佣思想,自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长官的附庸。所以说,兵为将募,就等于受将雇佣。兵对将有很大依附性,就必然导致“唯将命是从”。

募兵制,还具有一定的宗法性。它为军队中的官兵关系,蒙上了一层宗法色彩。募兵者被视为“家长”,被募者则被视为“家人”。中国近代最早实行募兵制的曾国藩所拉起来的湘军,“兵必自招,将必亲选……自成系统,故其将卒亲睦,宛如家人”。^⑪“招募士卒是由营官监视进行的。而且,营是一种父系组织,营官可能被称为‘父老’,哨官被称为‘小弟兄’,士卒被称为‘子弟’”^⑫。后来的北洋军,也把袁世凯当做大家长。冯玉祥每次招募新兵,总要到场亲自一个一个地验,一个一个地问。言传身教,极力使自己军队中的官兵,“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⑬冯在自己的部队中,也以家长自居。对待部下,哪怕是高级将领,也动不动就罚跪。当然,他也把自己过去的长官,看作比自己高一辈。1915年,冯

玉祥的十六混成旅驻顺庆时,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骂冯的部下是孙子兵,冯的部下愤怒,而冯却对部下解释说:“按历史的关系说,他们的旅长(武征祥)曾做过二十镇的协统,我是二十镇里出来的,你们又是我的学生,算起来你们不正是矮两辈吗?”^⑭ 国民革命军既然实行的也是募兵制,官兵关系的宗法色彩,也是难免的。蒋介石就曾对部下说:“校长在,出了问题有校长替你们作主,校长不在,你们就成了‘孤儿’了啊!”^⑮ 国民革命军办的军官学校、随营学校,往往使上下级军官之间,多了层师生关系。蒋介石的部下许多黄埔系将领,对蒋执“弟子礼”,把蒋称作“老头子”。“小的”对“老的”,只能孝敬、盲从,这是中国封建伦理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陈诚就经常对部属说:“国家党政大事,有领袖(老头子)负责,大家不必过问。”^⑯ 募兵制所产生的这种宗法色彩,把上下级分成了“长辈”——“晚辈”,“家长”——“家人”,是利用封建伦理观念,从心理上维系兵听命于将的微妙链条。

募兵制,还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一支部队,往往多由一个地区招募。招募者,又往往多从自己的故乡或自己所熟悉并有一定影响的地区招兵。冯玉祥补充新兵,绝大多数是从河南招募。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时,蒋介石不从革命政权统治下的广东招募新兵,也不从邻近的广西、福建招兵,却“委托陈果夫等在上海秘密招募”。^⑰ 国民革命军中,第二军官兵多湖南同乡,第三军多云南同乡,第四军多广东同乡,第七军多广西同乡。小生产的狭隘心理,具有强烈的盲目的排外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除了血缘“亲”,就数地缘(同乡)“亲”。“亲不亲,家乡人”嘛!军队有了地方色彩,官兵间的陌生感、隔阂感减少了,亲密感增加了。官长大多利用乡土观念,同乡之情,来拢络部属。部属则认为长官就是自己的同乡,可亲可信。“老乡长官”要是“发迹”了,自己也“光彩”,家乡也“沾光”。因此,总觉得在“老乡长官”手下供事,“顺心”。由不得把为“老乡长官”效力,当做了自己的“份内事”。这当然会起到维系兵听将命的巧妙作用。

总之,募兵制的最大弊病,就是军队容易为少数人所私有。陈独秀曾指出:士兵们“原来本无职业,或是失了职业,现在以兵为终身职业,终身要靠大帅吃饭,自然不得不昧着良心服从大帅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所不为”。^⑱ 中国近代募兵制,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及其后的乡勇部队。“这些部队建立之初,就由他们的领袖来招募和筹饷。这就把对朝廷的忠心,转移到军队领袖身上。”高级统帅,除非私人关系,“是很难指挥属下那些各人都拥有自己的队伍的将领。一个将领如果免职或退休,军队的忠诚是无法转移给新领导人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解散这支队伍”。^⑲ 这是说,募兵制和兵为将有,像一对孪生双胞胎,从近代募兵制实行那天起,兵为将有的现象就出现了。后来的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把北洋军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产,从而奠定了他爬上“最高宝座”的基础。袁氏死后,北伐之前,各省督军可自由招兵,自由作战,兵为将所私有,将拥兵以自重,使中国四分五裂,完全成为

割据之形势。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前的广东拥护革命的军队也存在着兵为将有的现象。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现在无论哪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克扣军饷,剥削人民,贪图私利,贻害苍生,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现。我做了骄兵悍将的傀儡,成为人民的罪人。过去如此,现在还如此。”^②1924年11月7日,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沙河燕塘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演说,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到会的什么总司令,什么军长……竟然各霸地盘,截留税收,包烟庇赌,鱼肉人民。要你们去打仗消灭敌人,就向大元帅府要饷要弹,稍不如意,则违抗命令,按兵不动。”^③看来大元帅和大元帅府调遣军队,是不怎么灵便的。国民革命军,仍然是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军队,实行的依然是募兵制,它就难免要存在着“兵为将有”的现实可能和“兵随将叛”的潜在危险。

二

为了使国民革命军成为执行“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军队,“而不至于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④,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的第一款就是:“为贯(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起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⑤国民革命军的《战时政治工作须知》规定:“战时之政治工作,必须使全部工作——能与党及政府之全部工作成为一致”。1926年7月,周恩来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最近目的,就是“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明白“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原故”;保证革命军队“遵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⑥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评价道:“各级部队均有党部之组织,接受党的指导与使命,而服党的工作,为党奋斗。此项制度,实为使军队党化,成为党的武力。”国民革命军设党代表、建党部、开展政治工作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国民革命军真正成为党军,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保护工农大众,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致力于国民革命。然而事实上,美好的愿望并没有全部变成现实,革命的目的只是部分的达到了,结果是功败垂成。

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确实是它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主要标志。第一,这一制度在约束军队的纪律,保证军队爱护民众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和旧军队比,“国民革命军的情形迥然不同……农民们不告士兵的状,而是处处亲切接待,送水送饭”。^⑦北伐军进军途中,不但不害民,还积极发动民众,使工农运动得到了蓬勃展开。李宗仁的第七军,在攻取平江时,就“借农民协会之助,组织农民敢死队,乘机袭北军。又由农民任侦探向导,乘孙军之虚而突击

之”，至获全胜^⑤。军卫民，民支军，这就是北伐军夺取胜利的重要条件。第二，当时军队中的官兵，由于大部分来自破落的农村，文化水平很低。政治工作的开展，鼓舞了斗志，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因此，北伐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是对中国旧军队制度的一大破坏，一大革命，正是军队制度有这一方面的革命，就使得东征和北伐的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还极不完善，并且存在着许多弊病。这就没能从根本上制止军队中“兵为将有”的现象，排除“兵随将叛”的危险，从而也就无法保证它自始至终地成为执行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军队。

其一，当时关于军队中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的法案和规定，不但没有约束军官忠于革命的办法，也没有限制军官权力、注重军队民主化建设、防止兵为将所私有的有力措施；反倒有不少有利于保障军官权力的“法规”。而且，党代表在军队中不仅没有取得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对军官将领的限制权也是极有限的。这就为“兵为将有”提供了方便，大开了绿灯。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但紧接着又规定：“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还规定：“党代表与主管官意见不同时，必须签署命令。”这样一来，党代表对于部队中的方针路线，事实上是无权过问也无法过问的，连拒绝副署命令的理由也没有。虽然该文件中规定：“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命令不得执行，同时应该报告上级党代表。”但是，党代表绝大多数都处于“客卿”地位。他们不参予募兵工作，军队不是由他们拉起来的，而往往是部队编成后再派进去，或者干脆是带兵长官自己物色的。实际兵权，在军官将领，而不在党代表。没有实际兵权，是无法使叛将的命令“不得执行”的。唯一可行的只有向上级党代表报告了。而上级党代表与上级“指挥官”比起来，同样处于无实际兵权的地位。只有再报告上去，直到最高上司邓演达。可他同样无法制止将叛，当眼见得何键、唐生智、张发奎等要拥汪叛变革命时，他也不得不弃职他往了。事实上，一旦将叛，党代表要么随将做附庸，要么逃命，要么被杀被逐。党代表独树一帜，拉住叛将手下的军队继续革命的例子是极少见的。至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其地位远在同级党代表之下，自然更无法限制军官将领的权力了。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颁发的《战时政治工作须知》明文规定：“宣传人员须富有服从性。”虽然规定政治工作人员“对于官长如有错误之处，尤须有守正不阿之态度”。但紧接着又强调：“万不宜有向任何人批评长官之行为。”这样，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还有什么“法宝”去约束军官将领永远效忠于革命呢？怎么保证军队永远为“党军”呢？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没有约束军官将领永